

建国以来邪教治理方式的回顾与反思^{*}

陈松涛

提 要：为了有效地预防、治理“法轮功”等邪教，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本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邪教治理方式的演进过程，对其不足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新形势下治理邪教问题的对策思路。

陈松涛，四川大学政治学院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新中国 “法轮功” 邪教治理 对策

所谓邪教，即假借宗教之名，制造并利用迷信邪说来蛊惑人心、控制与坑蒙他人、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邪教具有欺骗性、破坏性和顽固性等特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讲，邪教是社会矛盾及其危机的产物。从古至今，不同形式的邪教对诸多国家及其政权都产生过程度不等的消极影响。为了预防和处理邪教给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我国历代政府都采取了严厉的惩治措施。从已有的文献中可以知道，早在汉代以前，即有“执左道”的罪名出现。《礼记·王政》记载：“执左道以乱政，杀”^①。在此提到的左道即邪教，同时论及政府对邪教蛊惑民众行为的惩治方式。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到有关邪教的记录。至汉代，关于邪教的界定、社会负面作用及其惩戒等文献相继出现。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并收夏贺良、丁广世等为徒，因被中垒校尉刘向奏：“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病死。后夏贺良踵行教业，被朝廷以“执左道，乱朝政，颠覆国家，诬枉主上”之名诛之^②。魏时有令：“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③。隋唐以后，执左道罪不复独立存在，它被分解为造畜蛊毒罪、妖书妖言罪、造厌魅造符书咒诅罪^④。至明代，作为一介平民的朱元璋，因参加秘密宗教组织造反而获取国家政权，他深知秘密宗教或邪教危害社会秩序的严重性与方式，因而对秘密宗教或邪教皆施以严刑峻法。《明律集解·附例》记载：“凡师巫假借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一应左道乱正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⑤。清代统治者在制订“禁止师巫邪术”^⑥、严惩“造妖书妖言”^⑦等条款的基础上，还规定：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者，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⑧。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仍然面临治理邪教的问题。在建国 60 余年的实践中，政府的邪教治理方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种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如下：一是客观时代背景的变化及其各时期我国政

府面对的历史任务的变迁；二是执政党和政府自身对邪教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当前，邪教在西方部分国家的活动非常猖獗，加之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这些因素加大了我国境内的邪教对正统宗教的冲击、对社会和谐稳定局面的破坏，因而防范和综合治理邪教的工作日益紧迫。鉴于此，本文拟梳理建国后我国政府的邪教治理方式及其发展脉络，分析其相关措施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建国以来邪教治理方式的发展历程

我国古代社会大多称邪教为“左道旁门”。新中国成立后，邪教最初被定义为“反动会道门”，之后逐渐规范其称呼。称呼的不断改变，不仅标志着政府对邪教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其处理邪教的方式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归纳起来，该过程大致有以下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主要采用简单的惩治取缔方式。会道门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解释是：“会门、道门的合称，指旧时的某些封建迷信组织。”^⑨主要特指明清时期出现于民间、带有宗教性质的结社。它们大多有招摇诱惑、秘密结社、危害社会之虞。民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民生艰难，普通百姓为寻求精神安慰或人身安全而纷纷加入会道门，导致会道门活动泛滥。建国初期，会道门组织严重危及社会秩序和新生政权。为此，各地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取缔会道门工作。例如，1949 年 11 月 20 日，苏北人民政府公署发出公告，宣布取缔会道门。1950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将会道门成员作为反革命分子的主要构成之一，要求予以重点打击。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中也对打击会道门做了相关专门规定，对利用会道门组织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处以死刑或终身监禁。仅 1951 年上半年，苏北区就打击会首 2377 名，其中逮捕 232 名，取缔坛堂 773

处。1951年1月1日至5月31日,苏南区逮捕案犯727名^⑥。后来,“会道门”一词作为专用名词,特指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民间秘密宗教结社。1985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中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仍以会道门犯罪统称各类邪教犯罪活动,提出对“以反革命为目的,制造谣言邪说,炮制反动经文、训书,‘改朝换代’,或者煽动群众抗拒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蓄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构成组织、利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⑦进行严厉打击。

(二)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采用依法打击的方式。上世纪80年代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转型加快,各种社会矛盾因利益分配问题而不断凸显和强化。在此背景下,诸多邪教开始抬头,“门徒会”、“观音法门”、“三班仆人派”、“全范围教会”、“呼喊派”、“被立王”、“灵灵教”等邪教相继出现。为此,政府最初的处理方式依然沿袭“露头就打”的做法,然而由于缺乏定性的具体罪名,大多只能笼统归入“组织、利用会道门、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罪”,或者以诈骗罪、流氓罪、强奸罪等其他罪名定罪量刑,处理方式也显得较为单一。例如,在处理“被立王”邪教教主吴扬明的过程中,由于缺乏量裁的具体罪名,只能以强奸罪和诈骗罪依法判处吴扬明死刑。为了弥补这一制度缺陷,一些地方的公、检、法机关联合出台了一些针对邪教案件的补充意见,但这种细枝末节的修补依然无法改善缺乏具体罪名对邪教犯罪的依法处理的制约。针对这些问题,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旧《刑法》作了专门修改。刑法第300条规定了有关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在此,惩治邪教不再以反革命罪统称。1999年6月,“主神教”邪教案在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成为了全国范围内运用刑法300条的第一个典型案例。“主神教”教主刘家国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奸罪和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法轮功”邪教出现后,政府逐渐采用综合治理方式。伴随着社会经济成分和利益的复杂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进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亦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甚至出现信仰寄托、精神追求乃至行为准则上的紊乱状况,“法轮功”因此有了滋生蔓延的可乘之机。该邪教不仅具有中国历史上其他秘密教会和会道门的诸多共同点,亦有其特殊之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理“法轮功”邪教问题,政府吸取了过去的相关经验,开始了从单一的依法打击向全方位治理的转变过程。一方面,不断完善了反邪教法律法规。1999年10月30日和2001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一”)和《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简称“解释二”),用依法打击来挤压“法轮功”邪教组织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提出了坚持“依法打击极少数,团结教育大多数”的根本方针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突出思想教育,重在治本”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在坚持依法打击其首犯的基础上,突出教育转化,将教育转化作为对邪教实施综合治理的思想基础和最根本的着眼点,同时,加大宣传揭批的力度,揭露“法轮功”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本质,综合治理收效明显。

二、当前处理邪教问题举措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

“法轮功”邪教组织被取缔后,我国治理邪教的具体范畴、惩治原则和防范机制等日益明晰和规范,特别是综合治理的理念逐渐成为共识。但由于邪教复杂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治理邪教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不断地总结处理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完善当前措施,才能彻底铲除这一社会毒瘤。笔者以“法轮功”问题为例,分析了当前我国相关举措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

(一)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成功经验

1. 反邪教总体纲领首次被提出,全方位治理理念被贯彻。1999年因为“法轮功”问题颁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可以视为反邪教总体纲领第一次被提出。《决定》提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⑧。其中,《决定》对反邪教的功能和作用作了清晰的定义,提出了四项要求,一是对邪教组织坚决依法取缔,严厉打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二是坚持教育与惩罚并举的原则,对绝大多数被蒙骗的群众要团结、教育,对极少数犯罪分子要依法严惩;三是要在全社会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律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四是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对邪教活动进行综合治理。将依法打击、教育转化、宣传教育和综合治理作为反邪教工作的重中之重加以提出,特别是实施全社会综合治理的理念,达到了打防并举,相互促进,标本兼治的治理目的。

2. 反邪教法律法规更趋规范。《决定》除了明确将反邪教斗争从单一打击引向综合治理的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即两个“解释”和一个“解答”的出台。其中,“解释一”主要是对邪教组织的定义进行了阐述,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致人死亡、奸淫妇女、诈骗、煽动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做出了明确解释。“解释二”主要是对邪教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做出具体规定。2002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再次发布《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解释二”在适用过程中遇到的若干

问题进行了解答。由于上述两个“解释”和一个“解答”的出台,惩治邪教犯罪活动的司法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有了清晰、具体、明确的解释和限定,使刑法第300条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各级司法机关在办理邪教类案件时,能够更加明确法律界限,准确定罪量刑。此后,各地司法部门均根据上述规定对涉案“法轮功”犯罪人员进行审判,对强化打击“法轮功”骨干人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创造了教育转化的全新模式。“法轮功”邪教组织者投靠国外敌对势力,成为了从事反华活动的政治工具,已经成为具有明确政治意图和政治野心的反动政治组织。但绝大多数“法轮功”普通练习者是怀着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愿望和对生老病死的关切心理参与其中的。他们的行为虽然违背了国家法律、影响了社会公共秩序,但其多数人对“法轮功”组织者的政治目的和险恶用心并不了解,并被“法轮功”组织所利用、蒙骗和愚弄,其本身也是受害者。在对这一部分人进行教育转化时,政府将他们同邪教组织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将他们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方,以教育挽救为主,帮助他们认清“法轮功”组织的性质与危害。这种教育方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终极理念。目前,这种教育转化方式已产生较好的效果,1999年登记在册的“法轮功”人员中绝大部分已经转化,回归正常生活。教育转化工作作为新中国处理邪教的创举,收到了以往任何一种措施都达不到的良好效果。

(二) 处理“法轮功”问题的不足之处

1、反邪教立法还未取得根本突破。自“法轮功”邪教问题出现以来,政府通过出台新的司法解释或修改原有的法律规定,反邪教立法工作有了长足进步,但目前的问题是,对邪教定罪的法律条文仅限于刑法300条和两个“解释”。其中,两个“解释”对邪教罪名的适用更加准确便捷。但从法理上分析,这些司法解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甚至连“法规”也称不上,其位阶较低;加之颁布反邪教法规的机构层次较多,这些法规分别出现在刑法典、人大常委会决议、司法解释等不同文献中。这种立法模式不利于打击邪教犯罪的执法和司法。其操作性、规范性也因此受到局限。这些法律规定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即只侧重于对邪教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而轻视对邪教组织的预防,缺乏专门机构对邪教等非法组织的产生、流传及其规律的深入研究。

2、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缺失。“法轮功”问题出现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直接组织和领导了处理过程,显示了我国行政机构有效的动员和控制能力。但从实践中看,这套运行机制不足之处在于刚性有余、润滑不足,仅仅依靠于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即使现有的反邪教组织大多也是在取缔“法轮功”后,在政府的帮扶下发展起来,许多地方的反邪教组织甚至就是科学协会下的一个二级机构,行政性非常明显,其主观能动性无法

自主激发。而作为社会细胞之一的非政府组织的缺席,市民社会的发育不良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薄弱,导致政府难免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出现了诸如地下组织传教情况控制和信息掌握上的困难,对流动人口和城乡结合地带邪教活动的管理缺乏强有力的手段等等问题。民间组织的缺席,使得处理过程中市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响应比较滞后,更谈不上非政府组织有力量、有能力为政府提供普及知识、帮助教育、为转化人员和家属提供后续保障等方面的支持。

3、传统宗教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在调查中可以看到,正统宗教力量较强,民众的正常宗教生活能够得以保证的地方,邪教势力就相对较弱,甚至无法立足。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正”与“邪”是水火不相容的,邪不压正,正可抑邪。邪教盗用或曲解宗教教义,将自己伪装成宗教,但传统(或正统)宗教在教理教义上却更完善更系统,与邪教又在不同阵营,传统(或正统)宗教即便出于维护自身纯洁,也是反邪教阵线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在正统宗教面前会显露其鬼魅原形的。但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我国传统(正统)宗教文化曾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健康、正当的宗教生活也曾受到挤压,无法正常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一部分群众的宗教需求无法从正常、合法的渠道得到满足,李洪志盗用来伪装其歪理邪说的零碎的佛教理论和概念,打动了缺乏宗教知识的群众,使得部分认知能力较差的群众沉迷其中,从而导致邪教滋生蔓延。

三、进一步完善邪教治理举措的建议

虽然治理“法轮功”邪教的工作已经持续12年,但是,该项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在国外,西方反华势力仍在对所谓的“中国门派领袖”给予重视和支持。“法轮功”组织者受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完全变成与藏独、疆独、台独、民运同台的五股反华势力之一,其渗透、分裂和破坏活动的力度不断加大。在国内,不仅还存在“法轮功”顽固者的违法和抵御行为,其他邪教也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对此,必须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完善当前的反邪教措施,以彻底消除这一社会毒瘤。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处理邪教问题的新举措大致如下:

(一) 加快制订系统的《反邪教法》。坚持对邪教问题依法治理,依法处理邪教问题是国际通行做法。简单归纳,目前各国的反邪教立法情况大致有三种:一是有专门的反邪教法,如法国颁布的《阿布—比尔卡法》,它是世界第一部反邪教法;二是宗教立法时加入有关限制邪教的内容,如日本的《宗教法人法》、俄罗斯的《良心自由和宗教协会联邦法》;三是针对具体的邪教组织立法,如日本的《关于限制滥杀无辜团体的法案》就是专门针对奥姆真理教制定的^⑨。这些国家的相关立法及其运作模式给我们提供了较好的范例。多年来,我国政府在对邪教的打击处理、宣传揭批、教育转化、防范控制

等许多方面,都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工作方式和成熟经验,有必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坚持下去。同时,对于邪教滋生、存在和发展的规律,邪教的本质与社会危害,邪教的治理措施等的研究也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鉴于此,我国制定《反邪教法》的条件已经成熟^⑧,建议尽快制定并出台相关法律。

(二) 强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目前,中国社会转型已进入加速期,社会的多元和复杂趋势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结构转变的推动力,也使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依赖的许多制度失效。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允许或支持自主组建、自主管理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因此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客观而论,目前,非政府组织的正向功能大多体现在社会经济、文化、福利等领域,如开展公益性、互益性活动等,而应对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时,其作用尚不明显。在应对“法轮功”问题上,具有广泛性和渗透性的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家庭援助、心理咨询、犯罪预防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鉴于此,建议有序地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反邪教的主流中来,形成体制内外反邪教的良性互动关系。例如,可以考虑引导民间多种形式的慈善、公益、教育组织及小团体参与反邪教工作,培养或强化志愿者反邪教的共同意愿,强化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下述功能:一是调节、稳定或平衡多数社会成员的心理,铲除邪教滋生与蔓延的土壤,预防和监控邪教的发生,形成广泛的防范体系;二是形成独立的社会救治体系,在邪教习练人员帮教、已转化人员回归社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三是形成多维度的教育体系。具体而言,从宗教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方面研究邪教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关的知识体系,为反邪教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三) 充分发挥传统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以抵御邪教蔓延。传统(或正统)宗教与邪教是天敌。由于邪教主要由篡改正统宗教教义而来,且与正统宗教争夺信众和社会资源,所以正统宗教识别邪教的能力很强,批判和打击邪教的积极性最高。鉴于此,被动地等待传统宗教对邪教发挥“天敌”、“天然屏障”的抵御过程,尚不如主动积极地调动和发挥传统宗教的“制邪”功能以防范与抵御邪教。而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宗教的积极作用,一是要全面切实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心实意地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这是发挥宗教作用以抵御邪教的基本前提;二是积极引导宗教界努力发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这些公益活动是传统宗教深度融入并影响社会生活、与邪教争夺信众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路径;其三,在正统宗教教义中,大多都有与邪教相左的教义教礼及其价值诉求。这些重要的思想资源值得认真发掘,对相关经典、教义应作出适应时代发展的阐释。这是增强传统宗教自身魅力、吸引力以抑制邪教的思想条件。

(四) 借鉴他国惩治邪教的有益经验。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较大,受邪教危害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而在反邪教的实践中形成的预防和治理模式也各有特色。例如,欧洲大多数国家对宗教团体的登记实行区分的政策,德国、法国等设立了专门机构应对邪教威胁,比利时、法国等还有专门的反邪教法。欧美等国依靠长期形成、且趋于完善的法制环境和先进的立法技术,即或没有专门的反邪教法或反邪教法尚不完备,亦能通过金融、税收、移民、反毒品、武器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则,将邪教的社会危害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有效地预防和打击了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虽然西方部分国家出于利益考虑,在国际社会中利用邪教问题攻击中国人权状况,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或拒斥这些国家有益的相关经验。

(责任编辑:文一)

★ 该文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2009 年度重大研究项目《宗教政治学》(编号:2009JJD730004)、四川大学 2008 年度校级重点课题《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① 《礼记·王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77。
- ②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卷 75,列传第四五·李寻。
- ③ 《通制条格》,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卷 29。
- ④ 武乾:《中国古代对巫术邪教的法律惩禁》,上海:《法学》,1999 年。
- ⑤ 《明律集解·附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0 年,第 934 页。
- ⑥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卷 766,刑部·礼律·祭祀。
- ⑦ 同上书,卷 780。
- ⑧ 同上。
- ⑨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 5 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年,第 790 页。
- ⑩ 刘平:《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55 页。
- ⑪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中有关问题的通知》,1985 年 9 月 5 日。
- ⑫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1999 年 10 月 30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 ⑬ 大弓:《试析处理法轮功问题对中国反邪教立法的推动》, <http://www.kaiwind.com/llyt/200911/t101202.htm>。
- ⑭ 社会问题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宗教教派与邪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59 页。